

传教士学者与中西学术桥梁：近代教会大学的汉学贡献探析

杨睿琦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省西安市，710128；

摘要：中国的近代教会大学不仅是中西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汉学研究的学术重镇。近代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产物，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来华传教士学者凭借其双重文化背景，在推动西方汉学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本文以近代教会大学的汉学贡献为研究对象，探讨传教士学者如何构建起中西学术交流的桥梁。并以近代教会大学的特点与来华传教士的角色为切入点，探讨了教会大学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独特性，分析来华传教士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来华传教士作为教会大学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者，其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和宗教理念深刻影响了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他们不仅是西方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然而，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也带有鲜明的文化调和色彩，其成果既受到基督教视野的局限，又因贴近本土而呈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通过分析教会大学的汉学教育、学术成果及其影响，本文试图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中西学术互动中的历史作用，为理解近代知识转型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海外汉学；教会学校；传教士；近代教育

1 汉学的发展历程

汉学（Sinology）作为一门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学科，其近代发展历程与中西文化交流密不可分。从16世纪耶稣会士来华到20世纪教会大学的学术实践，汉学经历了从传教士主导的“古典汉学”到专业化学科体系的转变，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近代汉学的萌芽可追溯至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研习汉语与中国经典，开创了系统性的汉学研究。他们翻译《四书》，编撰《葡汉辞典》，并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形成了“适应策略”下的早期汉学范式。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更成为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重要推手。到了19世纪，伴随殖民扩张，汉学逐渐脱离传教框架，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欧洲大学设立汉学教席（如1814年法兰西学院首设汉语教授职位），研究重心转向语言、历史与文献考据。传教士如英国的马礼逊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法国的儒莲专攻敦煌文献，奠定了实证主义汉学传统。同时，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本成为西方理解儒家思想的标准读本。最后到晚清至民国时期，教会大学成为汉学研究的新阵地。燕京大学的洪业、辅仁大学的陈垣等中国学者与传教士合作，引入西方史学方法重构国学研究。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1928）更促进中西学术对话，推动文献学、考古学的现代化。此阶段汉学呈现双重路径：西方学者延续实证研究，而中国学者则借西学方法革新传统考据，如胡适的“整理国

故”运动。二战后，汉学逐渐分化为“区域研究”与“中国本土学术”两条脉络。费正清等学者将社会科学理论引入汉学，关注近现代中国变迁；而中国学者则在国际化背景下重新诠释传统，如饶宗颐的跨文化研究。21世纪以来，数字人文、全球史视角进一步拓展了汉学的边界。近代汉学的发展折射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传教士的译介到专业学科的建立，再到本土学术的现代化，汉学不仅塑造了西方的中国观，也为中国学术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其历程证明，跨文化知识生产始终是双向对话而非单向输出。

2 近代教会大学的历史背景与特点

2.1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

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为文化渗入和政治需要，在我国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有着与中国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从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内开始掀起了拯救国家危亡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的新浪潮，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救亡图存的革新与学习的尝试和努力。中国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都面临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和重组。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促进了国人的觉醒，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根源，并试图扭转局势而进行种种尝试，这个时期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对传统的教育进行了改革。所以从清

政府中的开明实力派到士大夫的维新人士纷纷致力于对西方教育的求索,希望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来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培养人才,以此来改变中国命运。

同时这样的特殊时期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传播教育思想和理念提供了契机: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基督教传教士借此机会大量涌入中国,试图传播基督教信仰。传教士们认为,教育是传播宗教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中国各地创办了众多教会学校,从小学到中学,最终发展到高等教育阶段。

2.2 近代教会大学的特点

教会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独特景象,其“西方化”属性使其建立伊始便有别于中国的教育模式,培养人才也迥异于封建士大夫。教会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教学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独特的课程体系。教会大学根植于宗教和西方教育体系,因此重视宗教、英语和科学教育,注重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宗教课程熏陶,使学生思想和行为宗教化是教会大学的指导方针。长期的宗教陶冶既增强了学生对基督教的认同感,也培养了一批神职人员与信徒,促进了基督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这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初衷相呼应。而对英语教育的重视,不仅适应了打开国门后中国社会对英语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极大地提高了教会大学的竞争力。科学教育是教会大学从中国传统教育中脱颖而出的另一个重要武器。传统教育过多重视人文课程,因此教会学校借西方自然科学之长,积极引用科学课程,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最早设立了农林专业,为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还开设了商科,为中国商界培养了大量人才。学校课程可以体现一个学校的培养目标,教会大学课程设置上的这些特点鲜明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重视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是衡量一个学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教会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与优秀师资密不可分,雄厚的师资为教会大学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打下了基础。由于教会大学的双重目的,在早期难以聘请到既有学问又有献身精神的老师,多由教会神职人员兼任,主要为外籍教师,还有少量中国教师。随着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以及基督教本土化的诉求,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于是教会大学相应地增加了中国本土教师的比例,与外籍教师一起,形成了“中西结合”的师资特点。由于师资匮乏和促进优质师资交流,还聘请兼职名师来学校讲学,专兼结合。教会大学还采用了形式灵活的派遣制度。

以辅仁大学为例,该校教师来源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从当地著名大学聘请名师;二是吸收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三是不拘一格举用人才;四是由教会选派的人员。在保证教师多样来源的基础上,教会大学给予优秀教师的待遇也相当优厚。

2.3 来华传教士在教会大学中扮演的角色

虽然从19世纪初起就有基督教传教士入华传教,但人数极少,并且传教的方式也是秘密的。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传教士开始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公开地借助各种方式,向尚未听过福音的中国人传播基督教。随着教会活动的深入开展,为了更好更快地传播宗教,一些教会学校开始出现。虽然创办教育不是传教士的最初目的,但是在传教逐渐深入的情况下,英美的基督徒愈来愈感到传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有太多需要拯救的“灵魂”。但当时因为中国民众对外国传教士的福音有明显的排斥,所以传教士们不得不谋求讲道、布道的更好路径,最后开始尝试在中国创办学校。

首先,来华传教士是教会大学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者。他们不仅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还参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传教士们的教育背景和宗教理念深刻影响了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例如,燕京大学的创办者司徒雷登不仅是一位传教士,还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对燕京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来华传教士是西方知识的传播者。传教士们在教会大学中扮演了西方知识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不仅教授宗教课程,还引入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等。这些知识的引入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智力支持。

最后,来华传教士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传教士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他们不仅将西方知识引入中国,还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例如,许多传教士在教会大学中教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如国学、历史等。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4 近代教会大学对于汉学的贡献

近代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汉学研究领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学术贡献。研究表明,教会大学不仅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汉学人才,更开创了中西学术对话的新范式,为现代中国学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经典翻译与文献整理方面,教会大学在汉学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系统性地将中国经典文献译介至西方世界。以理雅各为代表的传教士学者,在教会大学的

支持下完成了《四书五经》的权威英译本,这一工程历时二十余载,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燕京大学的洪业教授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开创了现代中国古籍索引编纂的先河,极大提升了汉学研究的科学性。

在学术研究与范式创新方面,教会大学开创了中西结合的汉学研究新路径。辅仁大学陈垣教授在《西域人华化考》等著作中,创造性地运用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奠定了现代中国史学的方法论基础。齐鲁大学的顾颉刚通过“古史辨”运动,将西方疑古思潮与中国考据传统相结合,推动了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

在教育实践与人才培养方面,教会大学建立了完整的汉学教育体系。燕京大学设立国文系和国学研究所,采用“中西并重”的教学模式,培养了周一良、邓嗣禹等一批杰出汉学家。金陵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创了将田野调查引入汉学研究的先例,其学术成果至今仍具参考价值。

在学术交流与范式传播方面,教会大学构建了中西学术对话的机制。通过创办《燕京学报》《辅仁学志》等学术期刊,建立了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司徒雷登等教育家积极推动“中国化”办学方针,促进了汉学研究从“西方中心”向“中西平等对话”的转变。

近代教会大学在汉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具体学术成果的产出,更在于其开创的中西学术对话模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范式,既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也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为当代汉学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5 近代教会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在西方传教士由国家对华侵略战争依靠强权对中国近代封建制度和秩序的有力冲击下,带入了很多西方形式的制度、文化、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近代化,尤其是教育领域的近代化。更为明显的是在民族危亡、革命愿望强烈的时期我国的民族主义潮流发生深刻变化,但终究因其西方列强支持的特殊背景,教会大学的进程还是逐渐背离了我国人民革命的主流,最终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淡去,但其历史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教会教育重视教育教学实践,有效将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有别于中国传统科举教育侧重于四书五经等道德理论层面知识,教会学校带来了很多关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方面知识可应用于生活实际。如燕京大学,燕大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自然科学各系一般都有较为完善的实验室和各种为教学服务的仪器、设

备。学生在实验室或试验中每人都要亲自动手,写报告。报告的格式要求规范,图表数字必须精确,书写也要美观大方。因此,从实验课上学生不仅学得必要的知识,还养成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精神和态度。当今社会需要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人才,到真正的工作中更多的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而且以一种更加端正的态度和精神待人处事。教会大学学生不仅利用在校期间学习更多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利用自己所学来为社会基层人民和更多需求者奉献自己微弱的力量。就像当今的医学生和师范院校的学生都可以利用自己所学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需要时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教会大学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过程中对生学习过程的严格要求和学生自身的自我督促和监督,自我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承担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 结语

近代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产物,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来华传教士作为教会大学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者,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教会大学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为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通过对近代教会大学特点和来华传教士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张凤兰.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及其启示[D].江西师范大学,2016.
- [2]高磊.近代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及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8,(03):127-136.
- [3]王蔚.对中国近代教会教育的认识[J].安康学院学报,2007,(05):99-100. DOI:10.16858/j.issn.1674-0092.2007.05.029.
- [4]林真.近代初期教会学校的历史教育初探[J].亚太教育,2015,(25):274-275. DOI:10.16550/j.cnki.2095-9214.2015.25.088.
- [5]贺丹.教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意外”贡献[J].大众文艺,2010,(15):270-271. DOI: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10.15.233.
- [6]苏渭昌.二十一所教会大学始末简介[J].上海高教研究,1984,(02):39-48.
- [7]刘海燕.教会大学与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D].西北师范大学,2002.